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

总第五十四辑 2011.4

李海舰 改造我们的研究

朱富强 嘲讽计量经济学

聂辉华 张或 蒋敏杰 大学校长和书记如何实现「黄金搭档」？

刘毅 地方社会科学院又是干什么的？

欧阳峤 大国和大国经济

熊秉元 中年转岗自传

朱玲 感受金门

蔡晓峰 银行产品标准化猜想

王五一 澳门为什么这么火？

史晋川 偷鸡数百 获刑无期

曹利群 搞不懂的北京购车摇号制度

唐志军 为什么人们会热衷于考公务员？

李增刚 网络语言：存还是废？

冯维江 名字的经济学

姚洋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拜访科斯和福格尔教授

刘宝宏 凯恩斯的炒股智慧

刁仁德 清廷与功臣的博弈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经济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经济学是真学问

徐昌生

在中国有一个现象见惯不怪，那就是对待学问的态度很不一样。比如，说数学物理不敢冒充内行，说历史地理不会不懂装懂，但是，说到经济学，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门外汉，普通人常常为一种经济现象争得面红耳赤，常常对一项经济政策大放厥词，甚至经济学家也常常成为普通读者谩骂诅咒的对象。

学问何以被人轻视？专家何以被人怠慢？因为在许多普通读者的心中，经济学压根就不是一门真学问。为什么在普通百姓心中，数学物理是真学问，历史地理是真知识，而经济学却成了伪科学呢？因为对于大部分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确没有学习过真正的经济学。虽然每个人在中学时代都学过“政治经济学”，但教材与现实的反差让人无法心悦诚服。由于我们学过的经济学不能应用于日常生活与实际工作，所以人们拒绝承认经济学是一科学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不是经济学是伪科学，而是我们学过的经济学不是真科学，由此导致人们产生了信念上的固执、认识上的误区。吃多了地沟油，人们自然对一切食用油都抱着怀疑警惕的态度。

6年前，我也和其他人一样，执着地认为经济学就是伪科学，它不仅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远，甚至给我的感觉是有些胡搅蛮缠、胡说八道，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经济学家茶座》。当我在《茶座》里细细品尝着一杯杯来自生活的经济学香茗，当我细细聆听着经济学家们对生活现象的洞察、窥视到了经济学的别有洞天、风光无限，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秘密相联，才领悟到市场经济制度才是人类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源泉。

由此，我遐想万千，期望着有一天，那些手握重权干预市场的人，那些眼睛只盯着市场经济缺陷的人，那些信奉权力可以干预市场并给百姓带来好处的人，那些对经济学知识八窍通了七窍的人，都能到《茶座》来喝喝茶，让当初曾经沁入我心脾的浓浓茶香，也能驱散他们心中的迷雾，够让这些苍白混沌的头脑醍醐灌顶、幡然醒悟！

（作者系江西博能集团副总裁）



经济学家茶座

第 **54** 辑
2011.4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松奇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荆林波 顾海良
梁小民 黄少安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项目负责人
董新兴

特约编辑
李淑娟

特邀执行主编助理
雒亚龙

目录

□ 卷首语

徐昌生 经济学是真学问 / 001

□ 学问聊斋

李海舰 改造我们的研究 / 004
朱富强 嘲讽计量经济学 / 006
王 照 猴子与盐的故事
——关于经济学数学化的一点思考 / 011
周业安 课堂上经济学实验的趣味 / 012
韩朝华 自私与美德——品味《道德情操论》 / 015

□ 学界万象

聂辉华 张彧 蒋敏杰 大学校长和书记
如何实现“黄金搭档”？ / 019
刘 毅 地方社会科学院又是干什么的？ / 024
赵 泉 无名小辈挑战学术权威 / 028
吴要武 搞木可以拼也！ / 034

□ 国是我见

欧阳峤 大国和大国经济 / 040
陈 宪 50.2亿与0.2亿 / 045
邱 东 直线外推不保靠(外二则) / 047
巫继学 朝思暮想的共同富裕 / 052

□ 经济随笔

熊秉元 中年转岗自传 / 054
朱 玲 感受金门 / 057
蔡晓峰 银行产品标准化猜想 / 062
刘福寿 圆梦西沙 / 066
高 胤 中国古人的经济学智慧采撷 / 069

□ 经济评论

- 王五一 澳门为什么这么火? / 072
 史晋川 偷鸡数百 获刑无期
 ——司法归责标准及量刑的经济分析 / 077
 曹利群 搞不懂的北京购车摇号制度 / 080
 晏宗新 垄断现象面面观 / 083
 寇宗来 如何认识美国对华贸易赤字? / 088
 谢明干 创新, 最重要的是要创立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 091
 李仁君 中国房市调控的症结在哪里 / 095

□ 生活中的经济学

- 唐志军 为什么人们会热衷于考公务员? / 100
 李增刚 网络语言: 存还是废? / 106
 冯维江 名字的经济学 / 109
 郑联盛 一张银行卡引发的“信用危机” / 114
 赵红军 中国人银行卡持有量将跃升为世界第一 / 119
 蒲勇健 购房者说——投资者巧用供求原理的故事 / 123
 宋小川 闲暇、休闲与民生 / 126
 王苗苗 妾心如水意为谁
 ——读俞炜华老师的《婚恋与选择》有感 / 129

□ 经济学人

- 姚 洋 天意怜幽草, 人间重晚晴
 ——拜访科斯和福格尔教授 / 132
 刘宝宏 凯恩斯的炒股智慧 / 137
 王梦奎 陈易遗诗——话诗忆旧之一 / 142

□ 经济史话

- 刁仁德 清廷与功臣的博弈 / 145
 朱荫贵 近代工业化进程中活跃的民间金融 / 148
 汤铎铎 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与我国茶叶贸易的兴衰 / 153

□ 他山之石

- 李文溥 海参崴: 新砖与旧瓦 / 1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第54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12

ISBN978-7-209-05985-5

I. ①经… II. ①金…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第268403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012

Email: chazuo4901@126.com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7

82098028

邮购电话: (0531) 8209802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169毫米×239毫米 16开

10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 14.00元



学问聊斋

改造我们的研究

李海舰

1941年，在延安，针对当时的学风问题，毛泽东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供全党学习；2011年，70年后，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套用毛的这一范式，我写作《改造我们的研究》，供大家研究。

一、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研究？

(1) 数学至高，工具唯上。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的学术论文，其中绝大部分篇幅都是数学模型、公式，甚至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难易程度来评判论文质量的高低，走向了“为模型而模型，为公式而公式”的极端，并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这类论文，其实质是：用众所不知的模型说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过程非常复杂，结论非常简单，有方法无思想，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对此，因内已有学者指出：经济学和管理学，因为数学而兴盛，最终也因为数学而灭亡。

(2) 实证检验，众所周知。像农民生产粮食一样，学者就是生产思想的。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是发现真理，不是发明思想，而是证明知识或者常识，即很多已被“实践检验”过的知识或常识再拿来进行“实证检验”。例如，

知识溢出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信任与产业集群发展正相关，服务失误与企业绩效负相关，企业欺诈行为与消费者的再次购买意愿负相关，等等。目前，学界普遍患有“实证研究崇拜症”，不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而是“发现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3) “四重四轻”，人云亦云。首先，重发表轻实用。很多学者都是在为职称而研究，为职业而研究，而不是为解决问题而研究，即不停地为“生计压力”而制造“垃圾”。一篇学术论文，可以允许有缺陷，可以允许不完善，但绝对不能容忍没有用。其次，重方法轻思想。创新，包括方法创新和思想创新。这里，方法创新是术，思想创新是道。目前，整个地本末倒置。何况，所谓“方法创新”大部分是“照搬照抄”国外。再次，重规范轻创新。其表现是，形式越来越美，就是没有思想。过分强调规范，其格式化严重扼杀了创新。最后，重国外发表轻国内发表。目前，国内高校过分强调、重奖在SCI、SSCI期刊发表，轻视或忽视在国内一流期刊发表。而现实是，在国内顶尖期刊发表比在国外一般SCI、SSCI期刊发表更难，影响也更大。

二、我们的研究要坚持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1) 问题导向。任何一篇学术论文，都要循着“发现问题—解释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展开，而在“解释问题”这一环节，由于现有理论缺乏解释力，因而需要“理论构建—理论验证”，由此导致“理论创新”。目前，很多学者只会文献综述，不会凝练问题，不会提出问题。

(2) 三层分析。学术论文要沿着“数理分析—机理分析—哲理分析”思路展开。这里，数理分析仅是基础研究环节，但是，国内则把数理分析当成了唯一甚至最高研究环节，缺乏机理分析和哲理分析，由此导致“思想贫困”。

(3) 融入国学。“中国奇迹”、“中国问题”，背后都蕴藏着“中国元素”。现有研究只是用中国的数据来验证国外的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而在研究中融入国学，则是构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重要基因。

(4) 回归定性。科学研究之路应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定性研究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点。也就是说，所有的定量分析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定性分析基础上的，否则，再好也没有用；而定量分析的终极目的则是为定性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最终服务于定性分析。因此，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论文若不以定性研究为主，则必然影响思想深度的开掘。

(5) 制造思想。学术论文分为四类：制造思想，制造方法，制造知识，制造垃圾。制造思想应是学术论文的最高追求。作为学者，仅有常识、知识和观点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或思想体系。

(6) 顶天立地。一篇好的学术论文可用“三性”来衡量，即选题的前瞻性、内容的原创性、结论的实用性，即“理论顶天，实践立地”。

三、怎样改造我们的研究？

(1) 调查研究。实践出真知。经济学和管理学是实践性的学科，没有调查研究，不仅没有真知识，更没有真学问。何况，实践远远走在理论前面。思想源于实践，必须“向实践学习”。思想与生活阅历、经历相关，而数学与学历教育、知识相关。

(2) 思维创新。思维决定思想，思想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可见，思维创新是“源”，思维创新是“本”。所谓思维创新就是“悟道”，大学者都是“悟”出来的。这里，思维创新包括异质化思维、三段式思维、三分法思维、拆墙式思维、中医式思维、曲线式思维等等。

(3) 方法创新。我们不是否定数学，不是否定工具，而是更有效地运用西方的模型、公式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将工具与思想融为一体，工具为辅，思想为主，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正确路径是：“本土化的问题—西方化的方法—原创性的思想”，以此实现术道打通、形神打通、中外打通。

(4) 独立人格。只有不为生计所迫，不为权力所惧，不为利益集团所左右，学者才有独立人格。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的发展与创造性的活动需要有自由的空间，以鼓励思想的独立性，不受到权威和社会偏见的限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副主编)



嘲讽计量经济学

朱富强

计量经济学本身是基于对经济理论进行严密化这一目的而产生的，计量实证本身是理论探究的一个重要过程，它注重的是对事物内在因果关系的揭示。而计量经济学要实现它的原初宗旨，就需要将计量分析工具和经济理论有机结合起来，运用人的知性思维对计量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并将之与现有理论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这包括假设前提、影响因素以及数据处理等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一次或少量的实验结果就“证伪”原有理论，除非我们能够建立起一套逻辑严密的解释体系；同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计量结果来预测未来事件或者指导实践，除非我们对计量的假设前提与现实的各种因素作了仔细辨识。在很大程度上，只有揭示出事物之间作用的因果机理，我们才可以获得理论上的增进，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举一个例子。1847年 I.Semmelweiss 发现，如果医生在为待产孕妇接生前将手洗干净就会大幅减少产妇的死亡人数，但当他将这一发现告诉医学同行并劝他们改变行为方式时，得到的却是嘲讽，甚至自己也被逼疯而以自杀了结一生。究其原因，Semmelweiss 还没有发现洗干净手减少孕妇死亡的因果机理，也就没有建立起一套真正的理论。而直到后来 L.Pasteur 和 J.Lister 完成了细菌理论，对卫生为何至关重要作出了因果机理的解释，医生每年才认为手术前洗干净手是必要的。但不幸的是，当前绝大多数从事统计分析或计量实证的经济学家都是出身数学、统计学或物理学领域的，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经济理论素养，简单地依靠计量分析不仅无法揭示作用机制，反而常常得出一系列荒谬的论断。

亨利·庞加莱曾写道：“科学是由事实逐步建立的，正如房子是由石头渐渐垒砌的一样；但是，一堆事实并不是科学，正如一堆石头不是房子一样。”^[1]显然，单纯的计量实证至多能够提供有关“是什么”的事实，却无法揭示“为什么如此”的原因，从而也就无法直接导向理论。正因如此，计量分析必须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只有具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才能从计量实证中挖掘出因果机理并将之上升为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如果缺乏足够的经济理论指导，而仅仅凭一些非常片面而狭隘的数据处理就得出结论，那么，往往会犯下“瞎子摸象”和“见树不见林”的闹剧。这里可以举几

[1] 庞加莱：《科学与假设》，转引自杰弗里·M.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7 页。

个例子。例如，传统的观点认为，饭后不要马上就躺下不动，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但是，目前一些学者凭借其狭隘数据的实证研究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饭后走路对身体健康很不好。再如，传统观点认为，必要的性生活对维持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是必要的，它有助于舒缓人的精神压力并进而活跃人的思维；但是，最近的一些实证研究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性生活钝化人的智力。所有这些结论似乎都有数据的支撑，从而符合现代经济学强调的客观性要求；但是，所有这些结论却没有能够揭示机理，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如此”。

读者不要急于反驳说，这些似乎根本与经济学研究无关，不仅它们所研究的东西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分析的结论也与经济学理论似乎没有任何关系。相反，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就在做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学人已经将盛行于经济学界的计量方法和实证分析推广到绝大多数领域，而不管这个领域是否属于传统经济学的。例如，笔者在英国 Exeter 大学经济系访问时参加了系列 seminar，其中一位主讲者的题目就是“人的胖瘦与学术成就的关系”，他在计量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肥胖会妨碍学术成就。再如，一个更为荒谬的实证研究是英国华威大学的青年经济学人巴克斯所作的，他自我感觉长相不差，但在 30 岁之前却有 3 年找不到女友。于是，他写了一篇论文《为什么我没有女友：应用德雷克公式在英国找寻爱侣》，宣称在茫茫人海寻觅真爱人的几率仅比在浩瀚星海中寻找外星人容易一点。其做法是：把 1961 年发明的德雷克外星文明数量公式（Drake Equation）中符合外星文明条件的变量转为自己的择偶条件，先考虑全英女性人口，再以“伦敦女性人数”、“适合年龄层（即 24 至 34 岁）”、“有大学学位”以及“外形具吸引力”等因素逐步缩小范围。运算结果发现，全英 300 万女性中仅 26 人可能成为他的理想女友，而一晚外出可以结识到这些女子的机会仅为 0.0000034%。^[1]显然，这种研究是荒谬的，因为人类的真爱本身是社会性，需要互动和相互付出才可以得到，而不是符合某些客观条件就成；事实上，如果按照经济学的这种思维，真爱反而很容易获得，因为只要将个人偏好输入互联网进行配对就行了。

在很大程度上，上述所谓的“研究”都不是传统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甚至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具有基本知识的领域；但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学术取向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却转向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篇篇“前沿”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在实证拜物教以及求新求异学风的支配下，现代经济学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已经到了匪

[1] “英国经济学家：比寻外星人容易一点 找到真爱几率 0.0000034%”，<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int/sinchewdaily/20100114/23221114015.html>。



夷所思的程度：一者，经济学家可以与任何学科进行联合研究，而不需要相关方面的基本知识；二者，经济学家运用计量分析对一些新领域进行分析往往会得出一些新的结论，而不需要探索其内在的作用机理。譬如，目前经济学界有很多文章探讨教育的收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最优教育水平的选择等问题，但是，他们却对教育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几乎一无所知，不了解公共教育与私人教育间的差异，不了解自然科学教育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间的差异，不了解教育收益的社会外部性，甚至也不了解教育对个体偏好的影响；但这些人凭借这样的研究，却要为国家教育提供政策建议，岂不可笑！

即使在传统的经济领域也是如此。例如，过去二、三十年里发展经济学家十分钟爱的“跨国增长回归”的统计学方法就主要依赖于数据集的精心搜集整理，这些数据只要能够描述大量国家多年的 GDP、政治体制、教育程度以及其他变量，然后将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然后观察一国经济中有哪些特征与经济增长相关。显然，这种研究策略可以并已经得出了太多的答案。2002 年，发展经济学家 Romain Wacziarg 用尖刻的笔调写道：“那些宣称可以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灵丹妙药，包括高有形资本投资率……低生育率、距赤道远、低热带病发病率、临海……和条件适当的外国援助。”我已经省略了瓦奇亚克列出的 17 项“灵丹妙药”。他还指出，这个名单“正变得越来越长，永远列不完”。^[1]而且，利用这种跨国增长回归证明的大量统计学关系中有不少是相互矛盾的：如有的证明外国援助能够促进增长，有的则说不能促进增长，还有的论证说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促进增长。更具嘲讽意味的是，赫尔辛基大学的博士生 Westling 的论文《男性器官与经济增长：尺寸有关系？》利用“跨国增长回归”方法并在其中加入一些相当反常规的数据后却发现，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与该男子阴茎的平均勃起长度有关。确切地说，1985 年勃起尺寸居中国家的国民收入水平最高，而 1960 至 1985 年间阴茎勃起尺寸则与经济增长呈反比关系，而 13.5 厘米的勃起阴茎长度则是“能够使 GDP 最大化的尺寸”。^[2]而且，Westling 强调，他采用的是标准的统计方法，结果具有鲁棒性；这种相关性无论在统计学上还是经济学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换言之，这项统计结果大到不容忽视的地步，不会只是巧合而已。当有学者问 Westling 如何形容自己的研究论文，他提出了“嘲讽经济学”这个术语，并补充道：“从科学角度讲，

[1] 蒂姆·哈福德：《嘲讽经济学》，载于《金融时报》2011 年 8 月 18 日，何黎译。

[2] Westling T., Male Organ and Economic Growth: Does Size Matter? University of Helsinki, Discussion Paper No.335, July 2011. <http://www.slideshare.net/roadpizza/male-organ-economic-growth-does-size-matter>.

这篇论文很可能和当代经济学大多数论文一样毫无价值可言。”^[1]

尤其是，尽管统计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站不住脚甚至荒唐可笑，将统计学关系转变为一项可行的政策非常困难，但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却往往基于其实证研究而提出政策建言。举目前在西方社会正日益勃兴的气候和环境经济学为例。经济学家对人类经济活动如何影响大气和环境的作用机制知之甚少，却简单地通过数据的处理来对相关问题指手画脚。譬如，2009年下半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之际，我在英国 Exeter 大学参加的一个 Seminar 就涉及这类主题。主讲者的大致结论是，计量数据表明，GDP 的增长以及二氧化碳的排放与全球温度上升并没有正相关性，因此，长期被认定的“二氧化氮排放量增加会引起‘温室效应’”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全球气候会议制定的二氧化碳减排方向根本是“庸人自扰”。确实，迄今为止所使用的气候模型大多未能预测近年来的温度骤增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些模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更不要说，目前有关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本身也存在问题；而且，即使研究所选取的数据没有问题，目前也没有二氧化碳排放与温度上升间存在正向关系的研究发现。这也不能得出不应减排的主张。一者，影响气温变化的因素除温室气体之外还有其他诸多因素，如浮尘对阳光的遮挡、城市化产生的“热岛”、海洋对热量的吸收而导致大气变暖的滞后，以及地球本身也许正处于“寒冬”周期，等等；二者，即使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气温上升可以为其他因素的变化而抵消，也不能得出二氧化碳减排无足轻重的结论，因为二氧化碳排放也会为人类带来其他危害，这包括环境污染会导致的基因变异、疾病爆发，甚至直接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心情，等等。此外，即使气候变暖是一个确切的事实，我们也无法由简单的计量模型来证实高温是由气体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所引起的，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逻辑机理的分析以及其他经验的推测。一者，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已表明，二氧化碳分子能够吸收红外线辐射，从而使得温度变高，这也很容易在实验室中得到检测；二者，天文学的观察也表明，有高密度温室气体的金星的地表温度达到了水的沸点的多倍，而缺乏温室气体的火星的地表温度非常低以致水无法以液态形式存在。

可见，尽管作为处理经济数据以剖析经济现象之间关系的一门日益精确的工具，经济学研究中运用实证方法和计量工具是无可厚非的：一者，它可以使得纷繁芜杂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从而可以更清晰地对现象进行描述和刻画；二者，它借助数学逻辑而有助于认知的严密化和精确化，从而有益于思想的发现和传播。但是，我们必须

[1] 蒂姆·哈福德：《嘲讽经济学》，载于《金融时报》2011年8月18日，何黎译。



清楚，计量结论仅仅告诉了我们一些事实，而这些事实并不能展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和因果机理，而这一切又有赖于研究者的智性思维。一般的，不同学者对同一“事实”的解读往往是不一样的，而解读的合理程度则与他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有关：一个学者的知识结构越广、理论素养越深，那么，他就越容易通过现象挖掘本质，其得出的结论也就越真实。不幸的是，随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教育越来越偏重于数学技能而越来越忽视基本的思维训练，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者也越来越缺乏足够的经济理论素养；相应的，他们就无法正确合理地使用计量分析工具，甚至往往误读了计量结论。诺思写道：“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误解现实的概率远比正确理解现实的概率大得多，因而认识现实的本质就很重要。”^[1]显然，当前计量经济学领域就是如此：大多数经济学人只关注如何应用这些计量工具而很少探究这些方法对研究经济现象的适用性，而且，这些大量形式优美却没有经济理论内涵的计量结论往往很难经得起思辨逻辑的耙梳，甚至很多结论本身就是缺乏基本常识的，但是，它们却往往被当做“创新”和“洞见”而传播。正因如此，我们对这些“洞见”应该持有最大限度的审慎。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现任教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1] 诺思著，钟正生、邢华译：《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 页。

猴子与盐的故事

——关于经济学数学化的一点思考

王 照

经济学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阐述一些深刻的道理。在这方面，《经济学家茶座》中的诸多文章堪称典范。这对于当今门槛渐高、数学至上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更显得弥足珍贵。原来，除了冰冷、晦涩的数学模型和冗长、复杂的数字表格之外，还有另一种轻松、自然、有趣的方式来阐述经济学！

有人调侃说，中国式教育最大的功能就是抹杀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这话有点偏激，但发人深省。

在如何进行经济学教育和传播的问题上，是不是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呢？

我想，《经济学家茶座》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那些被面目可憎的经济学吓倒的人找回对于经济学最本真的兴趣与最初的好奇心吧。

关于经济学数学化的是非功过的争论，从经济学引入数学分析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认为，经济学应当像物理学那样精确、严密，只用公式、数据讲话，否则，就是不合格的经济学。也有人认为，经济学的数学化不过是日益激烈的竞争下，经济学者们设立的一个高门槛而已。对于这两种观点，我都不敢苟同。

小时候曾经听到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猴子发现，放过盐的面条会变得特别好吃，就偷了一罐子来。它想，这可是个宝贝，何不多多益善？就将一罐子盐全倒进了面条中。结果面条变得无法下咽。猴子一生气，将盐罐子打翻在地，说：“上当了！原来是个坏东西！”

其实，在某些事情上，我们自己何尝不是那只猴子？在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心理状态下，为自己，也为他人，制造出了多少“无法下咽的面条”呢？而事后，我们不是从自身找原因，却总是抱怨那个“盐罐子”。

起初，经济学主要偏向于语言描述和逻辑推理，缺乏数理分析，缺乏模型检验。这就像无盐的面条。虽然味道一般，但尚可下咽。后来，随着现代数学的发展，有人将数理分析、模型检验引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之中了，经济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有了巨大的进步。这，就像在面条里加了盐。但问题是，一些学者把数学当成了猴子眼里的盐罐子，拼命地加，有的甚至把面条丢了，干脆只吃盐。觉得这样才够高级，才叫过瘾。其结果当然是可怕的：要么饿死，要么因电解质失衡而死。于是又有人站了出来，将怨气撒向“盐罐子”，说：“这数学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是回到过去比较靠谱些。”其实，反对也罢，拥护也罢，经济学数学化的宏大步伐是不可阻挡的，这也是经济学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数学化”没有问题，但不能“泛数学化”，否则就会有本末倒置，甚至走火入魔之嫌。对于经济学来讲，数学既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种比较先进但也并非全能的分析工具。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供职于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军队政工系）



课堂上经济学实验的趣味

周业安

经济学来自生活，却很少回过头去关心生活。对经济学家而言，宁可抱着一堆精美的模型，也不愿意去搭理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所以经济学家常常痛心疾首，觉得不被世人所了解。即便是弗里德曼这种智者，实在忍不住，也只是寻求电视媒体的帮助，搞一个通俗的解说词，来宣讲其关于市场的理念。但看了他的作品，究竟有几个人真的理解了市场和价格机制，真的理解了市场背后的各种经济学的思想？无法考证。从我多年的学习、研究和教学经验看。理解者占比应该不会高。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学家所能够给大众的是一个所谓的均衡想法，而究竟这个均衡在现实世界中如何展示？没个明确的说法。消费者也好，企业也罢，抑或是政府、各种产品和要素市场，在教科书上都幻化为几个函数和曲线，实在匪夷所思。

当然，我们说，理论就是高度的抽象，是对现实世界基本规律的概括。那如果学习者在学了理论之后，面对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无法把两者联系起来，更无法从抽象再回归具体，那么学了理论，也就等于没有学，都还给老师了。所以，当年张伯伦站在哈佛的讲台上，讲授微观经济学的时候，决心要打破这种刻板的不切实际的教学方式。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个考虑，张伯伦讨厌不切实际的完全竞争市场，因为这种市场在现实当中基本上找不到。既然现实当中不存在这种市场，在教授经济学时，又何必花大把的时间让学生去学习和考试？为了让学生理解真实的市场和真实的经济学，张伯伦在上世纪40年代的哈佛课堂上，放下了课本，开始把教室变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市场：学生分两拨，一拨是买方，一拨是卖方；每个学生可从老师那获取一定数量的禀赋（钱和货物），然后作为买方的学生和作为卖方的学生就可以拿着货物或者钱在教室里相互谈生意，做成一笔，就把价格和数量记录下来。张伯伦把这些交易结果汇总起来，做成图表给学生看，然后让学生们思考自身参与其中的这个模拟市场为何出现这样的结果。

毫不意外，张伯伦的结论是，模拟市场并不支持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均衡很难出现。只是由于这样一种游戏还不够精彩，所以虽然很多学生参与，却没有激发足够的兴趣。比如弗农·史密斯就是其中一位。史密斯那时正在哈佛念书，抱着好奇之心参加了张伯伦的课堂实验，事后并没觉得这游戏有多深刻，也没对其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有何影响。直到后来史密斯毕业后来到普渡大学教书，亲身教经济学课程后方知当年张伯伦的良苦用心，于是也就想起了张伯伦的课堂实验方法。史密斯想：当时的实验为何不吸引人？是不是实验的设计出现了一些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史密斯认为，在张伯伦的课堂实验中，成交的价格和数量没有立刻公开，这可能导致市场信息不畅，也就意味着张伯伦当年的实验其实从设计上就没有满足完全竞争市场的信息要求。同时，张伯伦的实验是一次性的，并没有形成一个较长时期的交易，而现实的市场通常是有有一个较长的交易期的，也许考虑多期交易，均衡就出现了。于是从1955年开始，史密斯在张伯伦的课堂实验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在6年时间内做了11个课堂实验，结果令人惊奇！史密

斯发现，如果考虑成交价格和数量瞬时公开，同时交易反复多期，那么成交价格和数量明显收敛于某个值，也就是说，均衡出现了！

看到这，你可能很不屑：这游戏有意思吗？其实非常有意思。道理很简单，教科书上说，完全竞争市场必须有众多的买者和卖者，单个的买者和卖者必须是价格接受者，也就是说，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单个人是那么渺小，以至于其一举一动对市场的交易结果本身丝毫没有影响。而史密斯的一系列实验结果表明，即便是市场上没那么多买者和卖者（毕竟课堂上参与实验的人很有限），只要价格公开，给定一段时间，整个市场交易就会趋向某个均衡。这就使得价格机制的有效性的条件并不需要像教科书上说的那么苛刻，也并不像张伯伦早期猜测的那样市场那么的没效。市场在简陋的条件下仍然是有效的！尽管当时大多数人对这个研究很不以为然，但不得不承认，实验方法有可能得出意想不到的结论，而这可能是引发经济学变革的重要契机。

以上是关于张伯伦和史密斯的故事。现在我们再来讲另几个人的故事。有两个犹太人，一个叫卡尼曼，一个叫特维斯基。这两个人的关系可不一般，属于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的那种。因为二战的缘故，两人都在以色列寻找自己的理想，都入过伍，后又都研究心理学。在希伯来大学那会，两个人越聊越投机，就想着一起研究点什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两人都对个体的决策非常感兴趣，特别是个体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传统的理论认为，个体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会去发现各种可能事件出现的客观概率分布，然后依据这个概率分布来评估方案。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并不同意这点，一个关键的分歧在于，他们认为个体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根本不可能确知这个客观概率分布，而只能根据自身经验和知识去估计一个概率分布，即个体决策实际上依靠的是主观概率！一旦牵扯到这个主观性，那么个体在概率判断的时候就会出错。这就好比早上出门上班，看到天阴沉沉的，天气预报说，这是阴天，下雨的可能性很低，但你就是不放心，还是带了把伞，以防万一嘛！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把这种现象称为对小概率事件的高估。当然，反过来也可能存在对大概率事件的低估问题。

如果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仅仅停留在概率问题上，就不会对经济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了。话说上世纪70年代，他们前后脚来到了美国，特维斯基在斯坦福大学谋得一个心理学教授的职位，卡尼曼随后来访，就在斯坦福大学的美丽校园里，他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学。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转向，因为当时对决策理论最关心的就是计算机科学、管理学和经济学，而只有经济学家在固守着一个理性经济人假说，其他两个都开始讨论有限理性等问题了。其实很多学者都厌烦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说，但经济学家又离不开它。究其缘由，一来是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错误的，二来这个假说对于建模实在是便捷。当然，要打破经济学家的这个理性经济人神话，必须提出一系列的科学证据才行。于是他们想到了做实验。其中一个著名的实验是这样的：假设美国准备援助救治一种罕见的亚洲疾病，提案者称，这种疾病如果不及时救治，将导致600人丧生。现有两个救治方案：A方案如果被采用，将能拯救200人；B方案若被采用，则三分之一的可能性让600人完全得救，三分之二的可能性是一个也救不了。你将支持哪种方案？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寻找许多志愿者来回答这个问题，结果大部分被试者（参与实验的志愿者）选



择了 A 方案。紧接着，卡尼曼和特维斯基重新修改了两种方案的表述方式：如果采用 C 方案，400 人将丧命；如果采用 D 方案，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没有任何人丧命，三分之二的可能是 600 人全部丧命。然后寻找被试者回答。实验结果表明，大部分被试者转而选择 D 方案。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其实 A 和 C 等价，B 和 D 等价。那么为何选择结果反差这么大？原因很简单，人们在决策的时候，往往会受到问题的描述形式的干扰！C 方案中，确定的 400 人死亡太刺眼，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会回避这个方案。

传统的经济学一直坚持理性经济人假说，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是不会被玩字眼这种小把戏所迷惑的。而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一系列实验表明，其实我们都不够聪明，恰恰容易在各种小把戏上吃亏！为了让经济学家脑子更为清醒，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特意把其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在经济学的专业刊物上。对经济学家的这种挑衅最终以心理学家的胜利而告终。史密斯和卡尼曼还共享了 2002 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特维斯基没有获奖，因为他在 1996 年就去世了。在结束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故事之前，还需要提及一个叫塞勒的人，他当时也在斯坦福大学访学，有幸聆听和参加了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讨论以及实验，并由此获得启发，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假如你买彩票，突然中奖了，得到了五千元奖金，你将如何花费？你每个月有五千元工资，你将如何花费？几乎每个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说，中奖的钱要多花，工资则要合理花。塞勒由此建立了一个消费理论，取名叫心理会计理论，其意思就是说，每个人对不同来源的收入所采取的消费态度完全不同。这就推翻了过去那种不看钱的来源、只看钱的数量传统理论。塞勒后来成为行为金融学的创始人之一。

以上都是外国人的故事。现在我来讲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我给本科生开设经济学原理课。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告诉学生，自己编辑了一本杂志《趣味经济学》，按月出版，现在开始征订。当然，学生们都认为这是真的事情。我给出了两种订单，一种是三个价格方案的组合：A、印刷版，每年 6 期，全年优惠定价 48 元；B、电子版，每年 6 期，全年优惠定价 24 元；C、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每年各 6 期，全年优惠定价 48 元。你会选择哪个价格方案？很多同学选择了 C。第二种订单是：A、电子版，每年 6 期，全年优惠定价 24 元；B、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每年各 6 期，全年优惠定价 48 元。结果这次多数同学选择了 A。两种订单的差别在于第一种多了一个单纯的印刷版，而就是这点干扰了学生们的决策。这就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早期提出的所谓参照点的理论，即每个人决策的时候都会去寻找某个参照点，不同的参照点确立后，会影响其后的决策。第一种订单参照点是单纯的印刷版；而第二种变成了单纯的电子版。这种参照点的变化直接导致选择结果的差异。

我做的这个实验并不是原创，艾瑞里在《怪诞行为学》里一开始就写了。只不过学生们阅读了这本书，并没有记住，而在课堂上参与游戏后，或多或少记住了。而且不仅记住了，还对理性经济人的认识更为深刻了，这才是课堂实验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私与美德

——品味《道德情操论》

韩朝华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舆论重新关注道德,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也随之名声鹊起。但细审国内关于《道德情操论》的各种议论,大都止于对道德重要性的强调,真深入理解斯密道德观的并不多。因而尽管《道德情操论》眼下在中国很有名,但多数国人对斯密的道德观其实相当陌生。

理解斯密的道德观,首先要弄清的一点是,斯密所讲的道德哲学与中国人习惯理解的“道德”有很大区别。在中国人的习惯思维中,“道德”主要涉及人的品性和修养,道德理论是关于个人行为规范的知識体系。但在斯密时代,“道德哲学”是一门庞大的综合性学问,它涵盖了探讨和阐释人类社会规律的全部知识。斯密计划构建的道德哲学体系就包含了哲学、宗教、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等多个社会领域。斯密的道德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怎样的社会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好社会(a decent society)。凡认真通读了《道德情操论》的人都会发现,此书探讨的重点不在于个人该如何行为,而在于个人为什么会成为合乎道德、行为适宜的人。这一思考和阐释的实质重点在于揭示个人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基础上实现社会合作的基本机制。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关于人性的假设是全书立论的前提,因而意义重大。斯密的《国富论》中关于人性自利的论点众所周知,且经常被视为当代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滥觞。但许多人看到《道德情操论》的书名并听说斯密在此书中讨论道德问题后,往往望文生义地以为斯密此书是反人性自私说的。但实际上,《道德情操论》对人类原始本性的设定是相当消极的。

在《道德情操论》的第三篇第三节里,斯密指出,人在本性上是自私的(self-love),在自己的极小利益损失和与自己无特殊关系之人的重大利益损失之间,每个人重视前者的程度大大超过后者。只要我们一直从我们原始自私的立场来度量他人的各项利益,他人的利益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就绝不可能与我们自身的利益等量齐观。斯密举例说,如果中华大帝国及其无数居民突然被一次大地震完全吞没,一个与中国毫无关联的欧洲人可能会觉得悲伤,并发出人生无常的叹息。但他在如此表达了人道情感之后,仍然会与往常一样自在、平静地继续其工作和享乐,好像并无这种意外发生过一样。但要是他明天将丧失自己的一



一个小指头，他今晚就会焦虑不安，彻夜难眠。（第 162 ~ 163 页）

在此基础上，斯密进一步提出，人有追求他人赞赏、规避他人怨恨的本能。造物主教导人们在被同胞赞扬时感到愉快，而在被同胞反对时感到痛苦。这使得个人总在有意或无意地根据周围人对自己行为的好恶来调整自身行为，以使自己在他人眼中显得行为适宜和得体。（第一篇）斯密认为，人们竞争和追逐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关注和赞许，这是人出于本性的基本追求。

那么个人是如何了解他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和感受，并在他人的赞誉和怨恨之间趋利避害的呢？斯密认为，对于他人的感受和情感，人不可能直接体验到，但可以通过想象中的情景转换来体会和理解。斯密称人对他人感受的这种想象和体会为“同感”（sympathy）。这是斯密道德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斯密认为，同感的产生，与其说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某种感情，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引起那种感情的情境。（第 6 页）因此，斯密所谓一个人的行为是否适宜或能否获得他人的赞许，实际上是指一个人的行为是否能够获得他人的认同和赞赏。能获得他人认同和赞赏的行为，就是适宜的行为，否则就是不适宜的行为。而人正是通过这种同感机制来了解社会对自己的看法，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社会的要求。

《道德情操论》中有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概念——“中立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这也是斯密道德理论中的一个代表性概念。谁是这样的中立旁观者呢？斯密认为，对于某种行为，如果每一个知道它的人都希望认可它，且乐于看到它受奖赏，那种行为就该受到奖赏；而对于一种行为，如果每一个听说它的人都怨恨它，且乐于看到它受惩罚，则这种行为就该受惩罚。（第 81 页）这说明，斯密所谓的“中立旁观者”其实就是指社会公众，他用这个概念来象征一种超脱于具体个人利益的社会立场，因而中立旁观者的态度实际上代表着被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是非标准。所以，在有的场合，斯密也称中立旁观者为个人心中的“判官”，甚至“良心”。（第 161 页）

《道德情操论》中下面这段话被各类研究者和评论者反复提及，即：“虽然每个人自然都偏好他自己的幸福甚于他人的幸福，但任何中立的旁观者绝不可能赞许我们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放纵我们自己的这种自然偏好……所以，每个人也许真的在他自己的心里自然而然地喜欢自己甚于喜欢全世界，不过他却不敢在众人的面前直视着众人的眼睛声明，这是他的行事原则……当他以其知晓的别人看待他的眼光来看待他自己时，他看到的是，对别人来说，他自己不过是众人当中的一分子，各方面都不比其他任何分子更重要。如果他想让自己的所作所为博得中立旁观者的赞许，他就必须贬抑他那妄自尊大的自爱，把它压低至他人能够赞许的程度。”（第 99 ~ 100 页）这段话清楚地显示，在斯密的心目中，